

内生无效制度^{*}

——对进入壁垒和贸易保护的思考

潘士远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一个模型来考察为什么垄断、进入壁垒和贸易保护在许多国家长期存在。政治精英对中间产品索取高价的偏好导致了支持垄断和贸易保护的无效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价格操纵机制表明,政治精英偏好于通过提高中间产品价格来增加垄断利润。提高税率虽然会增加政治精英的税收收入,但会降低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减少垄断利润。因此,价格操纵情况下的最优税率低于收入摄取情况下的最优税率,这与 Acemoglu (2006) 的结论相反。

关键词:垄断 制度 经济发展 规制

一、引言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利用资本积累途径的不同来解释各国间的收入差距 (Solow, 1956; Swan, 1956; Cass, 1965; Koopmans, 1965, 等等)。近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一些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沿用 Romer (1986) 的思路,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Romer, 1990; Aghion and Howitt, 1992, 等等)。沿着 Lucas (1988) 的思路,另一些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Becker et al, 1990; Goodfriend and McDerott, 1995; Galor and Weil, 2000, 等等)。^①然而,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一理论传统虽然给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增长机制的深刻见解,但它并不能提供一个关于各国间收入差异的根本解释。他们强调制度的差异才是经济绩效不同的根本原因 (North and Thomas, 1973; North, 1990; Acemoglu et al, 2001, 2002)。^②

Acemoglu (2006) 利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构建了一个框架来研究为什么无效制度会出现且长期存在。因为高税率和低生产要素价格会提高政治精英的收入,所以他们更偏向于这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这会导致无效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因此,无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可能会以一个均衡的结果出现且长期存在。但是,在许多国家,垄断会导致消费者和下游厂商支付高价购买一些生产要素,例如机器设备等 (Jones and Pura, 1986; Mobarak, 2006)。垄断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低效率的主要源泉之一。Parente and Prescott (1999) 更是指出,垄断会阻碍厂商采用先进技术,成为致富的最主要障碍。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构造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考察为什么垄断和高要素价格在许多国家盛行。

与 Acemoglu 假设政治精英与中产阶级都生产最终产品不同,本文假设政治精英与中产阶级分别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前者生产中间产品(机器设备),后者生产最终产品。由于中产阶级必须

* 潘士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310027,电子邮箱:shiyuan.pan@yale.edu。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 Romer (1994) 等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详细的综述。

② Acemoglu, Jonson and Robinson (2005) 评述了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购买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且需求函数向下倾斜,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的中间产品市场中,政治精英会对中间产品进行垄断定价。当然,政府能够通过发放许可证或解除进入管制来增加中间产品厂商的数量,从而促进竞争和降低价格。但是,因为高的中间产品价格能够增加利润,所以政治精英偏好于更少的许可证。^①换句话说,政治精英对中间产品索取高价的偏好导致了支持垄断和贸易保护的无效经济制度。因此,本文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政府对行业进入进行管制。与本文相同,公共选择理论 (McChesney, 1987; De Soto, 1990;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认为管制源于政客与官僚对利益的追求。但是,与本文不同,公共选择理论忽视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本文还可以解释为何风靡全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非自由贸易政策。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例如,Findlay 和 Wellisz (1982)、Hillman (1989)、Grossman 和 Helpman (1994),也强调了政治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但是,与本文不同,这些模型更多关注的是政客“出售”保护以交换更多竞选捐款等选举利益。

此外,在本文中,提高税率虽然可以增加政治精英的税收收入,但会降低中产阶级对于中间产品的需求,进而减少垄断利润。因此,价格操纵情况的最优税率会低于收入摄取情况的最优税率,这与 Acemoglu (2006) 的结论恰好相反。

本文第二部分建立模型,且在给定一系列政策的前提下描绘经济均衡;第三部分探讨收入攫取、生产要素价格操纵和政治巩固机制如何导致无效的经济政策:高税率和高垄断价格;第四部分说明政治精英是怎样偏好于无效的经济制度:不完全的产权和进入管制,而非更有效的制度;第五部分讨论为何无效的政治制度会作为一个均衡的结果出现且长期存在;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模 型

1. 经济环境

考虑一个离散、无限时域的经济。这一经济有两类人,一类为政治精英,用 e 表示,他们法定地拥有这一社会的初始政治权力,另一类为中产阶级,用 m 表示。政治精英与中产阶级的数量分别用 θ_e 和 θ_m 来表示。在这一经济中,所有人都是风险中性的,且其时间贴现因子均为 $\beta < 1$ 。确切地说,经济行为人 j 在 t 期的期望效用如下:

$$U_t^j = E_t \sum_{v=t}^{\infty} \beta^v c_v^j \quad (1)$$

其中, c_v^j 表示 j 在 v 期的消费; $j = e, m$; E_t 是 t 期在给定可用信息下的条件期望算子。

Acemoglu (2006) 假设政治精英与中产阶级从事相同的经济活动。可是,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获得许可证,政治精英(或者与政治精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商人)垄断着大型机器设备以及自然资源的生产或进口。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Suharto)将许可证发放给他的家人和亲信。他儿子的集团公司 Bimantara Citra 旗下的一个公司就得到了 12 种生产牛奶的必备品的进口许可证。而它的竞争者不能直接进口任何原料或者仅能进口三四种原料。在这一情况下,竞争者要么依靠 Bimantara,要么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低质量的国内替代品 (Mobarak, 2006)。Jones 和 Pura (1986) 曾指出,许可证直接导致了印度尼西亚的消费者和下游厂商支付高价。因此,本文假设政治精英与中产阶级分别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前者生产中间产品(机器设备等),后者生产最终产品。政府可以将许可证授予不同的政治精英来生产相同的中间产品。因此,这些政治精英的行为将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中间产品的价格。为简化起见,本文假设 N_t 个相同的寡头政治精英厂商被授予

① 这一结果不同于 Acemoglu (2006) 的结论,即为了增加利润,政治精英通过价格操纵来降低要素价格。

生产中间产品的许可证,且它们在市场上进行古诺竞争。^① 垄断厂商的生产函数如下:

$$y_t^e = k_t^e \quad (2)$$

其中, k_t^e 表示资本投入。相应地,每一个中产阶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y_t^m = \frac{1}{1-\alpha} (A_t^m)^\alpha (y_t^e)^{1-\alpha} (T)^\alpha \quad (3)$$

其中, A_t^m 为生产力水平, y_t^e 为机器设备的投入数量, T 为中产阶级的每一经济行为人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式(3)表明,中产阶级厂商都必须向政治精英购买中间产品。与 Acemoglu (2006) 相似,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假设物质资本与中间产品在使用后便完全折旧。由于最终产品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作为资本。因此,资本的价格为 1。

政府(政治精英)对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生产活动征税,税率分别为 $\tau_e \leq \bar{\tau}$ 和 $\tau_m \leq \bar{\tau}$ 。由于中产阶级能够隐瞒产出或将生产转移到非正式部门,因此,本文假设税率的上限为 $\bar{\tau}$ 。税收收入能够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参数 T_m 与 T_e 分别表示分配给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的转移支付。参数 $\phi \in [0, 1]$ 表示“国家能力”,它测度有多少税收能够用来再分配。 $\phi=0$ 意味着国家能力极低,所有的税收收入都流失了; $\phi=1$ 意味着国家能力极强,所有的税收收入都被集中起来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再分配。^② 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theta_e T_e^e + \theta_m T_m^m \leq \phi \left(\int_{S_m} y_t^m dm + \int_{S_e} p_t y_t^e de + R \right) \quad (4)$$

其中, S_m 与 S_e 分别代表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生产者集合, p_t 为中间产品在 t 期的价格, R 为自然资源的租金。

2.2 经济均衡

现在,我们在给定税收和许可证数量 $\{\tau_t^e, \tau_t^m, N_t\}_{t=0,1,2,\dots,\infty}$ 的前提下刻画经济均衡的特征。一个经济均衡由序列 $\{Y_t^e, Y_t^m, K_t^e, p_t\}_{t=0,1,2,\dots,\infty}$ 给出,使得在给定 $\{\tau_t^e, \tau_t^m, N_t\}_{t=0,1,2,\dots,\infty}$ 时,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都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中, Y_t^e, Y_t^m, K_t^e, p_t 分别表示在时期的中间产品总产出、最终产品总产出、物质资本总量、中间产品价格。

由于没有调整成本,且中间产品与资本在使用后便完全折旧,因此,厂商只需简单地最大化当期的净利润。这样,每个政治精英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pi_t^e = \max_{y_t^e} (1 - \tau_t^e) p_t \cdot y_t^e - y_t^e \cdot 1 \quad (5)$$

其中,净收入为 $(1 - \tau_t^e) p_t \cdot y_t^e$,成本为 y_t^e 单位的最终产品。

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意味着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出为:

$$\frac{\partial y_t^m}{\partial y_t^e} = (1 - \tau_t^m) (A_t^m)^\alpha (y_t^e)^{-\alpha} (T)^\alpha \quad (6)$$

因此,中间产品的总需求函数为:

$$Y_t^e = \theta_m (1 - \tau_t^m)^{1/\alpha} A_t^m T \left(\frac{1}{p_t} \right)^{1/\alpha} \quad (7)$$

式(7)表明,由于需求函数向下倾斜,政治精英厂商拥有垄断力量。根据式(6)和式(7)可知每个政治精英厂商的反应函数为:

^① 由于集体行动的问题等,政治精英难于合谋(如组建卡特尔)来摄取最大可能的垄断租金。另外,因为只关注垄断和高要素价格问题,所以本文没有讨论政治精英厂商进行伯特兰(Bertrand)竞争的情况。

^② 国家能力的定义源自 Acemoglu (2006)。为了简单且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 $0 < \phi < 1$ 。

$$p_t \cdot (1 - \tau_t^e) \cdot \left(1 - \frac{\alpha}{N_t}\right) - 1 = 0 \quad (8)$$

所以,中间产品的价格为:

$$p_t = \frac{1}{(1 - \alpha/N_t)(1 - \tau_t^e)} \quad (9)$$

由式(9)可知, $\frac{\partial p_t}{\partial N_t} < 0$, 这表明, 厂商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中间产品的价格。在本文中, 垄断定价是经济无效率的源泉之一。

将式(9)代入式(7)可得中间产品的总产出为:

$$Y_t^e = \theta_m A_t^m T [(1 - \tau_t^e)(1 - \tau_t^m)(1 - \alpha/N_t)]^{1/\alpha} \quad (10)$$

根据式(10)可知, 政治精英厂商所使用的总物质资本为:

$$K_t^e = N_t^e \cdot k_t^e = Y_t^e = \theta_m A_t^m T [(1 - \tau_t^e)(1 - \tau_t^m)(1 - \alpha/N_t)]^{1/\alpha} \quad (11)$$

因此, 由中间产品的价格与产出可得每个政治精英厂商的在 t 期的利润为:

$$\pi_t^e = \frac{\alpha \theta_m A_t^m T (1 - \alpha/N_t)^{(1-\alpha)/\alpha} [(1 - \tau_t^m)(1 - \tau_t^e)]^{1/\alpha}}{N_t^2} \quad (12)$$

式(12)表明, 政治精英厂商能够攫取到正的垄断利润, 但垄断利润随着税率 (τ_t^m 和 τ_t^e) 和厂商竞争程度 (N_t) 的增加而减少。

最后, 上述分析表明, 最终产品的均衡产出为:

$$Y_t^m = \int_{s_m}^1 dm = \frac{1}{1 - \alpha} \theta_m A_t^m T [(1 - \tau_t^e)(1 - \tau_t^m)(1 - \alpha/N_t)]^{(1-\alpha)/\alpha} \quad (13)$$

显然, 最终产品的产出是许可证数量的增函数。这是因为政治精英间的竞争降低了由高中间产品价格而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个有趣的结论是: 即使是在一个独裁的社会, 政治精英的竞争将增加社会福利。因此,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真正的民主前先提倡执政党内的民主或许是有益的。

为了以后分析的需要, 现将经济均衡概括为如下命题:

命题 1 给定税收和许可证数量 $\{\tau_t^e, \tau_t^m, N_t\}_{t=0,1,2,\dots,\infty}$, 经济均衡为 $\{Y_t^e, Y_t^m, K_t^e, p_t\}_{t=0,1,2,\dots,\infty}$, 其中, 中间产品的价格 p_t 由式(9)给出, 物质资本 K_t^e 由式(11)给出, 中间产品的总产出由式(10)给出, 最终产品的总产出由式(13)给出。

三、无效的经济政策

为了简单且不失一般性, 本节假设政治精英是独裁者, 只实施合乎他们需要的经济政策。第二节分析表明, 向中产阶级征税和进入壁垒是两大无效的经济政策。如同 Acemoglu (2006) 所说, 导致无效经济政策的三种机制为:

- (1) 收入攫取
- (2) 价格操纵^①
- (3) 政治巩固

在每一时期, 在政府(政治精英)设定税率后, 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进行投资。因为中间产品与物质资本在使用后完全折旧, 所以本文只考虑当前策略独立于过去的税收和投资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Markov perfect equilibrium)。政治均衡被定义为在给定经济均衡时, 一组使政治精英效用最大

① 如引言所述, 不同于 Acemoglu (2006), 本文讨论的是对中间产品的价格操纵。

化的经济政策序列 $\{\tau_t^m, \tau_t^e, T_t^m, T_t^e\}$ 。

每个政治精英的消费来源于垄断利润与收入转移,所以,一个代表性政治精英的消费为:

$$c_t^e = \frac{\alpha \theta_m A_t^m T (1 - \alpha/N_t)^{(1-\alpha)/\alpha} [(1 - \tau_t^m)(1 - \tau_t^e)]^{1/\alpha}}{\theta_e \cdot N_t} + T_t^e \quad (14)$$

从 $t=0$ 开始,给定 $\{\tau_t^m, \tau_t^e, T_t^m, T_t^e\}$,政治均衡必须满足式(4),且最大化政治精英的效用水平:

$$U_0^e = \sum_{t=0}^{\infty} \beta^t c_t^e \quad (15)$$

下面,我们刻画不同机制下政治均衡的特征。

1. 收入攫取

由于政治精英只关心合乎他们需要的经济政策,因此, $\tau_t^e = 0$, $T_t^m = 0$ 。这样,政治精英将会选择税率 τ_t^m 使税收收入最大化:

$$TR = \phi \tau_t^m \frac{1}{1 - \alpha} \theta_m A_t^m T [(1 - \tau_t^m)(1 - \alpha/N_t)]^{(1-\alpha)/\alpha} \quad (16)$$

经过简单计算可知,当 $\tau_t^m = \alpha$ 时,税收收入最大。换句话说,这一税率使政治精英位于 Laffer 曲线的最高点。显而易见的是,使最终产品产出最大化的税率为 $\tau_t^m = 0$ 。因此,收入攫取将会扭曲资源的配置。同时,因为市场竞争随着当政治精英厂商的数量增多而加剧,所以当 $N_t = \infty$ 时,市场是完全竞争,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高。这会最大化政治精英的税收收入,也即当 $N_t = \infty$ 时,税收最大。

由于税率上限为 $\bar{\tau}$,因此,均衡税率为:

$$\tau_t^m = \tau_t^{RE} = \min\{\alpha, \bar{\tau}\}$$

也就是说,在这一情况下,所有时期的均衡税率只取决于参数 α 与外生的税率上限 $\bar{\tau}$ 。

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如下命题:

命题 2 在所有的时期 t ,唯一的政治均衡是 $\tau_t^m = \tau_t^{RE} = \min\{\alpha, \bar{\tau}\}$ 和 $N_t = N_t^{RE} = \infty$ 。

2. 价格操纵

显然,式(12)表明,政治精英为了增加垄断利润偏好于更少的许可证。也就是说,政治精英偏好的许可证数量为 $N_t = 1$,因此,均衡的许可证的数量为:

$$N_t = 1$$

这一结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简单的。许可证数量的增多会增加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中间产品价格和垄断利润的下降。同时,由式(12)可知, $\tau_t^m = 0$ 使垄断利润最大。这是因为,对中间阶级的征税会降低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出,从而减少对其的需求和政治精英的垄断利润。很显然,最终产品产出最大化要求 $N_t \rightarrow \infty$ 。因此,价格操纵也会扭曲资源的配置。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得到:

命题 3 在所有的时期 t ,唯一的政治均衡是 $\tau_t^m = \tau_t^{PM} = 0$ 和 $N_t = N_t^{PM} = 1$ 。

因为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和垄断利润会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减少,所以价格操纵情况下的最优税率低于收入攫取情况下的最优税率。^① 这里,价格操纵的动机使得 $\tau_t^{COM} = 0$ 。这与 Acemoglu (2006) 的结论恰好相反。

较少的许可证数量提高了中间产品的价格。由于高价减少了中产阶级购买的中间产品数量,因此,如果技术蕴含于中间产品之中,价格操纵就会阻碍中产阶级对于技术的采用,不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一意义上,价格操纵对于经济的伤害比起收入攫取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 这里,“最优”意味着政治精英的效用最大化。

3. 收入攫取与价格操纵的结合

实际上,我们可以讨论收入攫取与价格操纵的结合是如何扭曲资源配置的。因为 $\tau_t^e = 0$, 所以政治精英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_{N_t, \tau_t^m} \frac{\alpha \theta_m A_t^m T \left(1 - \frac{\alpha}{N_t}\right)^{(1-\alpha)/\alpha} (1 - \tau_t^m)^{1/\alpha}}{\theta_e \cdot N_t} + \frac{1}{\theta_e} \left[\frac{\phi \tau_t^m \theta_m A_t^m T \left(1 - \tau_t^m\right) \left(1 - \frac{\alpha}{N_t}\right)^{(1-\alpha)/\alpha}}{1 - \alpha} + \phi_R \right] \quad (17)$$

这一问题的内点解的一阶条件为:

$$\begin{cases} \alpha(1 - \tau_t^m)(1 - N_t) + \phi \tau_t^m N_t = 0 \\ \phi N_t (\alpha - \tau_t^m) - \alpha(1 - \alpha)(1 - \tau_t^m) = 0 \end{cases} \quad (18)$$

显然, $\alpha(1 - \tau_t^m)(1 - N_t) \leq 0$ 表明许可证数量的增多会减少垄断利润, $\phi \tau_t^m N_t > 0$ 表明许可证数量的增多会增加来自中产阶级的税收收入。类似地, $-\alpha(1 - \alpha)(1 - \tau_t^m) \leq 0$ 表明税率的增加降低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进而导致利润的减少, $\phi N_t (\alpha - \tau_t^m) \geq 0$ 表明税率 α 使政治精英处于 Laffer 曲线的最高点。根据式(18)可知:

$$N_t = N_t^{COM} > 1 \text{ 和 } \tau_t^{COM} = \min \left\{ \left[\frac{\phi N_t^{COM} - (1 - \alpha)}{\phi N_t^{COM} - \alpha(1 - \alpha)} \right] \alpha, \bar{\tau} \right\} < \alpha$$

因为来自中产阶级的税收会因许可证的数量增多而增加, 所以政治精英偏好于发放更多的许可证。因此, N_t^{COM} 总是大于 1。同时, 税率的增加降低了中产阶级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进而减少垄断利润。因此, 价格操纵情况下的最优税率总是低于收入攫取情况下的最优税率, 即 N_t^{COM} 总是小于 α 。

总结上述分析, 我们得到:

命题 4 在所有的时期 t , 唯一的政治均衡由 $N_t = N_t^{COM} > 1$ 和 $\tau_t^m = \tau_t^{COM} < \tau_t^{RE} = \min\{\alpha, \bar{\tau}\}$ 给出。

4. 政治巩固

现在, 我们来考虑存在中产阶级政治威胁时的政治均衡。假设在 t 期, 政治权力从政治精英手中转移到中产阶级手中概率为 q_t , 特别地, 我们假设^①

$$q_t = q_t(\theta_m c_t^m) \quad (19)$$

其中 $q_t(\cdot) > 0$ 。式(19)说明当中产阶级变得富裕时, 他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增加军事力量等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

当存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威胁时, 政治精英的最优选择不再是使其现时的消费最大化。在这一情况下, 我们用 $V_e(E)$ 来表示他们掌权时其效用水平, 用 $V_e(M)$ 来表示中产阶级掌权时他们的效用水平。因此, 我们有:

$$V_e(E) = \max_{N_t, \tau_t^m} \left\{ \frac{\alpha \theta_m (1 - \tau_t^m)^{1/\alpha} A_t^m T \left(\frac{N_t - \alpha}{N_t} \right)^{\frac{1-\alpha}{\alpha}}}{N_t \theta_e} + \beta [(1 - q_t) V_e(E) + q_t V_e(M)] \right. \\ \left. + \frac{1}{\theta_e} \left[\frac{\phi \tau_t^m (1 - \tau_t^m)^{\frac{1}{1-\alpha}} A_t^m T \left(\frac{N_t - \alpha}{N_t} \right)^{\frac{1-\alpha}{\alpha}} \theta_m}{1 - \alpha} + R \right] \right\} \quad (20)$$

① 替代地, 我们可以假设该概率为政治精英收入与中产阶级收入的比率的函数。但是, 主要结论不变。

$$\text{其中, } q_t = q_t \left[\frac{(1 - \tau_t^m)^{1/\alpha} \theta_m A_t^m T \left(\frac{N_t - \alpha}{N_t} \right)^{\frac{1-\alpha}{\alpha}}}{1 - \alpha} \right]。$$

根据包络定理,许可证数量和税率内点解的一阶条件由下式给出:

$$\begin{cases} \phi \tau_t^m N_t + \alpha(1 - \tau_t^m)(1 - N_t) - \alpha \beta_e N_t (1 - \tau_t^m) [V_e(E) - V_e(M)] q' = 0 \\ \phi N_t (\alpha - \tau_t^m) - \alpha(1 - \alpha)(1 - \tau_t^m) + \beta_e N_t (1 - \tau_t^m) [V_e(E) - V_e(M)] q' = 0 \end{cases} \quad (21)$$

当中产阶级掌权时,他们会向政治精英征税,增加许可证的数量,独占所有的转移支付,从而降低政治精英的效用,所以, $V_e(E) - V_e(M) > 0$ 。这样,比较式(21)和式(18)可知:

$$N_t = N_t^{PC} < N_t^{COM} \text{ 和 } \tau_t^m = \tau_t^{PC} \geq \tau_t^{COM}$$

许可证数量的减少一方面会提高中间产品的价格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会降低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减少来自他们的威胁。所以,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力,政治精英会选择 $N_t^{PC} < N_t^{COM}$ 。同时,如果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越低,那么来自他们的政治威胁越小,所以,当考虑中产阶级的政治威胁时,政治精英总是会尽可能地提高税率。也就是说,当有政治威胁时,统治者宁愿牺牲效率来提高掌权的可能性。因此,政治巩固动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比税收攫取与价格操纵动机相结合的情况还要严重。如果 $V_e(E)$ 远大于 $V_e(M)$, τ_t^{PC} 将接近于税率上限 $\bar{\tau}$, N_t^{PC} 将接近于 1。此时,经济是最没有效率的。

如果租金越多和(或)国家能力越高, $V_e(E)$ 与 $V_e(M)$ 的差就越大。因此,式(21)表明,当 R 和(或) ϕ 增加,政治精英将会设置尽可能高的税率 τ_t^{PC} 。这一结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非常简单。很高的租金和国家能力使政治权力更有价值,因此,政治精英宁愿牺牲税收(过高的税率会降低总税收)来增加掌握权力的可能性 (Acemoglu, 2006)。

总结前面的分析可得:

命题 5 在所有时期 t , 唯一的政治均衡由 $Q_t = Q_t^{PC} < Q_t^{COM}$ 和 $\tau_t^m = \tau_t^{PC} \geq \tau_t^{COM}$ 给出。

四、无效的经济制度

在本文中,导致无效率经济制度的机制如下:为了将中产阶级的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上,同时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政治精英倾向于实施无效的经济政策,因此,他们也偏好于支持无效政策并使其成为无效经济制度。为了简单且不失一般性,我们考虑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1) 产权安全,用 $\bar{\tau}$ 表示。

(2) 对进入(或价格)的管制,用许可证数量 N 表示。

首先讨论无效率产权制度的决定机制。假设在 $t = 0$ 期,政治精英能确保中产阶级产权的安全。换言之,在任何投资之前,政治精英能把 $\bar{\tau}$ 从 $\bar{\tau}^H$ 降低到 $[0, \bar{\tau}^H]$ 之间的水平。虽然式(12)表明,产权安全会增加垄断利润,但是,产权安全会减少来自于中产阶级的转移支付。因此,当政治精英同时关心垄断利润和转移支付时,我们有:

命题 6 精英偏好于 $\bar{\tau} = \bar{\tau}^H$ 。

这一命题表明,如果经济制度由政治精英决定,那么他们将选择不为中产阶级提供额外的产权安全。因此,无效率的经济制度将支持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福利的无效税收政策。

显然,政府能够对一些行业的进入进行规制。^① 例如,中国政府禁止私人企业进入金融、通讯、

^① Gaessler and Shleifer (2003) 是一篇经典的关于规制的文献综述。当然,有些规制可能对经济有利,如对产品质量、生产安全性的监管,等等。

石化等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通过进入管制,控制许可证的数量,从而控制价格。我们假设,在 $t=0$ 期,政府可以发放更多的许可证,促进生产者间的竞争。也就是说,在任何投资之前,政治精英能使许可证数量增加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N^H 。假设一旦政治精英得到许可证,便能永远合法地进行生产。于是,如果政府在 $t=0$ 期发放更多的许可证,中间产品价格将持续下降。但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效用,政治精英不会发放更多的许可证。

第三节分析表明,许可证数量的增多虽然能够增加来自中产阶级的转移收入,但会使竞争加剧,从而大大减少垄断利润。所以,他们不会发放很多许可证。因此,我们有:

命题 7 精英偏好于 $N < N^H$ 。

这一命题表明,如果经济制度由政治精英决定,那么他们不会选择加剧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因此,无效经济制度支持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福利的垄断政策。

命题 7 也表明,政治精英为了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倾向于设置进入壁垒。所以,这一命题能够解释为什么进入管制在许多国家盛行。例如,在莫桑比克,为了达到进入一个行业的要求,企业家必须完成 19 道程序,至少等待 149 个工作日和花费 256 美元。在意大利,企业家必须完成 16 道程序,支付 3946 美元的费用,且至少等待 62 个工作日来获得必要的批准(Djankov et al, 2002)。与本文相似,公共选择理论(比如,McChesney, 1987; De Soto, 1990;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认为管制源于政客与官僚对利益的追求。但与本文不同,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制度对无效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命题 7 也表明,贸易壁垒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政治精英(或与政客关系密切的商人)使其免于同外国竞争者和国内厂商的竞争。这能解释为何风靡全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非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自由贸易政策。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比如 Findlay and Wellisz (1982)、Hillman (1989)、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也强调了政治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但与本文不同,这些模型更多关注的是政客“出售”保护以交换竞选捐款等选举利益。

五、无效的政治制度

这部分将讨论为什么无效的政治制度会出现且长期存在。假设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一种是政治精英掌握所有的政治权力;另一种是中产阶级掌握所有的政治权力。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必须描绘中产阶级掌权时的经济均衡。

显然,如果中产阶级掌权,他们将会发放尽可能多的许可证,使中间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因为物质资本的价格是 1,所以若提高针对中间产品生产的税率,那只会等比例地增加其价格。这只会扭曲资源的配置,而不会增加税收的收入。所以,当中产阶级掌权时,中间产品的价格为 1, τ_i^m 为 0。同时,显然的是,当中产阶级掌权时,他们不会向自己征税,即 τ_i^m 。因此,当中产阶级掌权时,不存在扭曲资源配置的制度,经济效率最高。在这一情况下,式(6)表明,每个中间厂商的总产出为:

$$Y_i^e = \theta_m A_i^m T \quad (22)$$

相应地,最终产品的总产出为:

$$Y_i^m = \frac{1}{1 - \alpha} A_i^m T \theta_m \quad (23)$$

由式(23)和式(13)可知,中产阶级掌权时的最终产品的产出大于政治精英掌权时的产出。

既然中产阶级掌权时的社会福利比政治精英掌权时的要高,为何无效的制度会出现且长期存在?当政治精英生产者不能得到垄断利润和转移支付时,他们的效用将锐减,因此,如果不能得到补偿的话,他们不会将权力转让给中产阶级。当然,中产阶级可以承诺给予补偿以让他们放弃权

力。然而,由于存在承诺问题,这是不可置信的。^①因此,当政治回报很高(例如,高自然资源租金、税收和垄断利润)时,政治精英不愿意让步,而更可能镇压中产阶级的反抗。在这一情况下,无效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会长期存在。相反,如果中产阶级能解决他们的集体行动问题,采取示威、动乱、抗议、革命或军事行动而获得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改变这个体系,或至少获得政治精英的部分妥协,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有效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可能作为一种均衡结果出现(Acemoglu, 2006)。^②

六、结 论

为什么进入壁垒与垄断在许多国家盛行?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此流行?沿着 Acemoglu (2006) 的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与 Acemoglu (2006) 不同,在本文中,政治精英与中产阶级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政治精英生产中间产品(机器设备),中产阶级投入中间产品和劳动力来生产最终产品。由于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向下倾斜,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的中间产品市场中,政治精英生产者能够通过边际成本加价法对中间产品进行垄断定价。为了增加垄断利润,政治精英偏好于提高中间产品价格,由此会导致无效的经济制度(进行贸易保护和限制进入),从而保护垄断者的利益。如果政治精英丧失权力,他们将同时丧失垄断利润和转移支付,从而大大降低他们的效用水平。所以,尽管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他们也不愿意将权力转移给中产阶级。因此,无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可能会长期存在。

提高税率可以直接增加政治精英的收入,但会降低中产阶级对于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减少垄断利润。因此,价格操纵情况下的税率低于收入摄取情况下的最优税率。这与 Acemoglu (2006) 的结论恰好相反。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aron, 2003,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pp. 620—652.
- Acemoglu, Daron, 2006, "Modeling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1940.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pp. 1369—1401.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pp. 1231—1294.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 as Log-Run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ed.,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Elsevier.
-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pp. 321—351.
- Becker, Gary, S., Kevin Murphy and Robert Tamura, 1990,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pp. 12—37.
- Barro, Robert J.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5, *Economic Growth*, Boston: McGraw-Hill.
- Cass, David, 1965,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2, pp. 233—240.
- De Soto, Hernando, 1990, *The Other Path*,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 Djankov, Sime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2002,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pp. 1—37.
- Findlay, R. and S. Wellisz, 1982, "Endogenous Tariff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Restrictions and Welfare", In J. Bhagwati, ed.,

① 参见 Acemoglu (2003)。

② 本文也能与 Acemoglu (2006) 的第六部分一样,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讨论制度变迁问题。但是,由于主要结论不会改变,因此,本文省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NBER.

Galor, Oded and David N. Weil,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pp. 806—828.

Goodfriend, M. and J. McDermott, 1995, "Early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pp. 116—133.

Gr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pp. 833—850.

Hillman, A.L.,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 Chur: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Jones, Steven and Raphael Pura, 1986, "All in the Family: Indonesian Decrees Help Suharto's Friend and Relatives Prosper-But Monopolistic Practices, Said to Stifle Industry, Sap the Nation's Economy-President's "Sawab" is Hand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4.

Koopmans, Tjalling C., 1965,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Lucas, Robert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pp. 3—42.

McChesney, Fred S., 1987, "Rent Extraction and Rent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6, pp. 101—118.

Mobarak, A. Mushfiq, 2006, "Corrupt Protection for Sale to Firm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kshop, Yale University.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ente, Stephen L. and Edward C. Prescott, 1999, "Monopoly Rights: A Barrier to Rich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pp. 1216—1233.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pp. 1002—1037.

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pp. s71—s102.

Romer, Paul M., 1994,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pp. 3—22.

Shleifer, Andrei, and Robert W. Vishny, 1998,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pp. 65—94.

Swan, Trevor W., 1956,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32, pp. 334—361.

Endogenous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Pan Shi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Center for Research of Private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llowing Acemoglu (2006), we construct a simple model to investigate how the elite's preference for high intermediate good price translates into inefficient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rice manipulation mechanism implies that the elite prefer to high profits through monopoly pricing. An increase in tax rate declines the demand for intermediate good from the middle class, hence reducing monopoly profits, hence the price manipulation motive always decreases taxes to below the pure revenue-maximizing level, which is opposite to the case in Acemoglu (2006).

Key Words: Monopoly;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ul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H2, N10, N40, O10, P16

(责任编辑:松 木)(校对:晓 鸥)